

有序异质论视角下的“普通行话”

陈静宇 (Chen Jingyu)

苏州大学 (Soochow University)

e-mail: c827058403@163.com

Summary. *With the trend of peripheral language moving towards the central language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more and more jargons have entered the vocabulary system of standard language, resulting in a new lexemic stratum - common jargon. It's not only the result of the blurring line between standard and non-standard language, but also a proof of the variability of language system. This article used the Ordered Heterogeneity Theory on Language Variation to explain common jargon.*

语言研究方法与语言观有关，方法的改进与发展也是语言观的更替。过去，语言的抽象研究曾为语言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近年来，我们发现其局限性愈显，因而，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语言集团里实际运用着的语言上，即把在社会基础上研究语言学作为一种新途径。

随着 20 世纪 60 年代社会语言学的兴起，语言变异研究也发展起来。社会语言学创始人拉波夫把语言变异通俗地解释为表示同一事物的不同说法。而现在的语言学家更认同语言变异是人们在言语交际中使用的脱离常规的语言形式。为了更好的理解语言变异，需要先介绍几个与它紧密相关的概念。在现代语言学中变异性 (variability) 是语言系统的基本特征，具体表现为言语中大量变式 (variant) 的存在。变式是语言单位的具体形式，而变异 (variation) 可以理解为变式的使用过程 (Хомутова, 2005)。除此之外，还需了解一个术语——社会语言学变项 (sociolinguistic variable) (简称为语言变项)。它在描述语言变异现象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语言变项指拥有变异形式的语项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 2012: 60)，它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变式组成。语言变项可分为三类：指示项 (indicator)、标记项 (marker)、成见项 (stereotype) (徐大明, 2006)。指示项反映个人或集团所常有的、不因环境变化的社会特征，不反映说话语体的变化；标记项，既反映说话语体的变化，也反映社会特征；成见项代表一般成见所认为的某些社会集团的固有特征。

语言系统并非完全静止，而是不断运动。20 世纪末的语言现实中出现了边缘语向中心语移动的趋势，且标准语子系统与非标准语子系统之间的界限也日趋模糊。因此，在标准语的词汇系统中就出现了失去集团性的行话词 (行话属于非标准语，它是某些相对稳定的社会集团内部使用的一种言语变体，这些集团通常以相同的职业、社会地位、年龄等联结在一起)，这类词汇叫做普通行话。在交际时，标准语使用者在某些语言外因素的影响下会使用一些脱离常规的语言形式。例如，使用一些普通行话词以取代标准语中一些固定表达。这样一来，标准语子系统中就出现了变异现象。

以 Labov 为首的变异学派对语言变异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有序异质论是该派的思想之一。他们认为，无论从共时还是历时的角度来看，语言都是有序异质的客体。有序异质论的目的在于解释语言变异现象。语言是异质的，在大多数言语集团的同一种语言中，存在着不同的形式，这些不同形式可以是风格变体，功能变体，也可以是标准语、行话、俚语等等 (Labov, 1968)。这样看来，每一个言语社团所说的语言可以分为若干个子系统。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不是互补的，而是相互竞争的，说话人可以根据不同的语境、不同的交际对象而选择某一子系统进行交际。由于在一个人的语言能力中可以共存着几个不同的子系统，因而各子系统就有可能相互干扰，使子系统中出现变异成分 (徐通锵, 1987)。如果一个人的头脑中有标准语和行话这两个子系统，他

在使用标准语这个子系统进行交际时可能会带有一些行话成分，这些行话词就是他标准语子系统中的变异成分，而这些变异成分组成了语言变项——普通行话。而行话词在标准语子系统中的分布通常和阶层、年龄、职业等控制因素之间存在着共变关系。这样一来，在异质系统中发生的看似没有规律的现象，由于受使用者不同社会属性的控制而有了规律，呈现出了有序性，于是，异质的语言系统也呈现出了有序性。此外，Хорошева 1999 年的彼尔姆实验表明，普通行话不仅受年龄、性别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也受语体变化的影响。因而，可以把普通行话当作语言变项中的标记项进行研究。

语音、词汇、句法中都可能存在语言变项。而语言变项的研究方法最早始于拉波夫的纽约市英语卷舌音调查。他把语音变项定义为“一组表达相同语义的不同语言形式”。其后许多学者在研究词汇变项时也沿袭了拉波夫对语音变项的定义，认为词汇变项的变体是形式不同，但意义、修辞色彩、感情色彩等完全相同的词汇单位。但对于词汇这种较大的语言单位而言，很难确定两组完全表示相同意义的语言形式。因为即使有意义完全相同的词汇、语法形式，也总是会存在语体、色彩（风格）等方面的差异。因此，徐大明（1988）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受语义限制的语言变异和语言变项概念。他认为，语言变异可以是语言使用中处于互补分布中的任何一组语言形式，只要语言学家可以合理地给这一组形式确定一个共同功能，这一组语言形式就可以构成一个语言变项。例如，进入到标准语中的行话词，因为它们通常具有称名功能（用行话词填补标准语中的称名空白）和情感表现力功能，所以这些普通行话词就可以作为一个词汇变项。而 Walfram 认为语音变异是量的差异，其它方面的差异是质的差异，也就是说研究语音变异是依据语音变项使用频率来定义的，而词汇变异是使用哪些项目而不使用另外项目的差异（Hudson, 1980），所以，普通行话出现和零形式可以定义为这一词汇变项的变式。这样一来，拓宽了普通行话作为词汇变项的研究角度。

社会语言学的兴起使语言学家把目光聚焦到了语言变异现象上。普通行话的出现和分布同语言系统的异质性和有序性相关。而它作为一个词汇变项，组成它的变式不应只局限于语义相同，形式不同的词汇单位，而应拓展为该词汇单位的出现和零形式。

参考文献

1. Hudson R. A. Sociolinguis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2. Weinreich U, Labov W, Herzog M. I. Empirical foundations for a theory of language change [A]. // Directions for historical linguistics [C].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68: 95–195.
3. Хомутова Т.Н. Теория языковой вариативности: социо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 [J]. Вестник ЮУрГУ, 2005(11): 28–34.
4. Хорошева Н. В. О социальных «векторах» жаргонизации городской разговорной речи (экспериментально-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ая модель) [A]. //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троспектива,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и перспектива города и деревни [C]. Пермь, ПГУ, 1999: 182–188.
5.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社会语言学名词[J]. 中国科技术语，2012（3）：60–62.
6. 徐大明，语言变异与变化[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7. 徐通锵，语言变异的研究和语言研究方法论的转折（上）[J]. 语言研究，1987（4）：1–9.